

韩震

重建理性主义信念

理论界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重建理性主义信念

韩震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建理性主义信念/韩震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9.1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ISBN 978-7-101-06495-7

I. 重… II. 韩… III. 理性主义-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0587 号

-
- 书 名** 重建理性主义信念
著 者 韩 震
丛 书 名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责任编辑 王水涣
封面设计 惠 岩
版式设计 毛 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½ 字数 212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495-7
定 价 33.00 元
-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出版说明

实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推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重要举措。实施这一工程,旨在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一流的思想理论家、一流的记者编辑主持人、一流的出版家、一流的作家艺术家。为集中展示“四个一批”人才的优秀成果,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四个一批”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编辑出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文库》主要收集出版“四个一批”人才的代表作,包括理论专著论文、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作品等。按照精益求精、分步实施的原则,《文库》将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陆续出版。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8年12月

作者简介 | 韩震

1958年5月生,山东省阳谷县人。1997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价值观与民族精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创新基地主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首届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

主要著作有:《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生成的存在:关于人和社会的哲学思考》、《重建理性主义信念》、《历史哲学:关于历史性概念的哲学思考》、《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等,发表学术论文、译文280多篇。



目 录

第一章 理性的命运和未来

- 第一节 理性的历史命运 1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化应是科学的理性文化 7

第二章 抽象理性主义批判

- 第一节 理性概念分析 14
- 第二节 理性主义的兴衰 20
- 第三节 抽象理性主义的根本缺陷 38

第三章 非理性主义批判

- 第一节 非理性概念分析 52
- 第二节 非理性主义的演化 59
- 第三节 非理性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及其危害 75
- 第四节 非理性主义的挑战 91
- 第五节 对某些非理性主义观点的批判 100

第四章 理性的重建

- 第一节 理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117
- 第二节 理性:历史性与理想性的统一 126
- 第三节 理性:说明性与批判性的统一 139
- 第四节 理性:观念与行为的统一 158

第五节	理性:自由探索与遵循规范的统一	174
第六节	生命理性: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	186
第七节	理性活动综论	199

第五章 理性与社会

第一节	理性活动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209
第二节	理性与社会经济生活	220
第三节	理性与社会政治生活	233
第四节	理性与社会精神文明	246

第一章

理性的命运和未来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纪之交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既充满挑战又孕育机遇的时代。在我们即将告别 20 世纪和迎接 21 世纪到来的时刻,世界形势瞬息万变,国内的改革开放也日益深入,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为了在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占据尽可能有利的地位,为了正确而又顺利地完成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理智和科学思维的头脑。创造未来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应盲目地跟着感觉走,而应当依靠我们的头脑。

第一节 理性的历史命运

(一) 理性的遭遇

理性,一般说来,就是人类通过观念活动把握和处理生活环境,指导自己的实践行为的一种能力。对于理性,抽象地理解似乎很容易。但是,理性并不是一种超历史的先天能力,人们的理性只能表现在他们的实际活动和思考之中。理性是一种意向性活动,它只有在实际的思维和行为之中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对理性的理解必然带有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和个体特点的烙印。理性的具体性,看起来增加了理性自我反思的困难,然而也成为理性伴随历史发展的步伐而不断进步的前提之一。人们对理性富有特点的普遍追求,恰好可以消解被当成“绝对普遍”的特殊理性的僵死性质,使其历史地成为开放的、灵活的和不断发展的东西。

由于理性是具体的,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过,总起来说,自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以来,人们对理性的看法基本上是积极的。即使认为人的理性低于上帝启示的宗教权威,也往往把理智和智慧视为寻求和确立

信仰的有用工具。在大多数人看来,理性既是有用的能动工具,又是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制约力量。这就是说,理性既能让人感到自己高于一般动物,又能使人了解自己的有限性。理性是人们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明显表征,但又体现了人们在自然、宇宙、神、命运面前的界限感及自知之明。实际上,前一个方面是理性的工具功能,后一个方面是理性的价值理念功能。然而,在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方式产生之前,人们并没有自觉地区分这两个功能,基本上是统一地看待这两个方面的。

不过,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文化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式的理性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科学理性在认识自然和技术操作上的巨大成功,使人们逐渐地习惯于仅把它视为一种纯粹工具性的东西。工具理性与目的(价值)理性日益分离,并遮蔽了后者。作为手段的理性,却成为判断行为成功与否的标准。这样一来,人们往往把理性只当作是工具性的能力,而把人的生存目的、社会责任和人类命运的问题看成是理性之外的事。失去了价值理念约束的工具理性,很可能因其缺乏方向和积极意义而给人类带来灾难,而突飞猛进的工业理性又增强了灾难的毁灭性。人与人之间的算计与阴谋,是工具理性的消极利用;不计后果的工业污染,是工具理性失去理念约束的结果;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更让人感受到工具理性片面性的危险。一方面理性的自我解体,使自己只具有工具的性质;另一方面是片面的工具理性的危害,引起了人们对理性的恐惧和反感。这就是人们转向非理性的方面寻求价值基础和目的理性的认识论原因。另外,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社会根源。既然“理性王国”依然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反人性的,那么退回到非理性之中似乎成了可选择的一种途径。由此,非理性的身价开始升高,而理性的价值却受到了怀疑。理性从近代充当法官的地位,转而被推到被告席上,受到奚落、嘲笑和批评。理性从王位跌入地狱。

应当说,近现代理性的式微,除了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之外,其内在局限性也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对于近代以来理性观的局限性及其产生的根源,我们将在第二章做较为详尽的探讨,在此我只作简单扼要的表述。人们普遍认识到,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理性具有下列缺陷:

——抽象性,即把理性看成是超历史的普遍同一的性质,从而把理性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权力话语;

——先验性,即把理性看成是永恒不变的本质,从而把能动的理性变成了妨碍认识进步的僵死框架;

——片面性,即只把理性看成是纯粹工具性的东西,并完全否定人性结构中非理性因素的积极性质,从而把理性变成了缺乏方向、理念和生命力的观念形式;

——形而上学性,这是旧理性主义的根本缺陷,从而使思维着的理性不能全面地、具体地、历史地、发展地看待理性本身。

旧理性主义的上述局限性,导致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理性精神要求实事求是地认识世界,可形而上学的理性则凡事从已有的理论原则出发;理性精神要求健康的怀疑态度和批判力,可形而上学的理性则拒绝对自身的怀疑和批判;理性精神要求人们民主协商地解决认识和利益上的差异,可形而上学的理性则把自己视为绝对标准;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对全人类的命运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对自己的行为要有理智的约束,可形而上学的理性却把理性变成了没有任何价值约束的纯工具性的东西。显然,旧理性主义不能理性地对待理性,科学地认识科学,把科学理性变成了绝对化的、片面性的和缺乏发展动力的僵硬形式。这种理性为非理性主义的反动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在这种意义上说,西方非理性主义起源于形而上学工具理性的过分发展。

如果说西方的非理性是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分发展而出现的结果的话,那么中国的反理性的非理性话语却更多的是西方舶来品与前科学理性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历史上也有深厚的实用技术理性,这种理性曾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

明。相对而言,西方更重视理论理性的探索,尽管这造成了技术发展的暂时滞后,但其技术的发展却有深厚的理论根基;中国文化更注重实际的社会伦常关系和实用性技术,因而中华文化在古代的优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屡屡受挫于西方人的科学和技术力量,因此才又恨又爱地开始学习科学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科学理性,在中国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科学理性本来应当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产物,但现实却是我们不得不掌握这个曾经让我们吃了很多苦头的东西。“以夷制夷”的口号,就说明了科学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外在性。我们不是把科学理性看成是文化成长的一部分,而只是看成不得已而为之的外来的东西(夷)。这就是说,理论理性的根基在我们的文化中扎得还不够牢固,一遇风吹草动,就会轻易被动摇。而原有的实用理性传统,由于缺乏深厚的理论根基,很容易丧失理性信念,向非理性主义投降。

在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和所谓“后现代”文化气氛的感染下,中国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非理性文化现象。例如:

- 封建迷信现象的回潮;
- 对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的恐惧和敌视;
- 感性粗俗文化的流行;
- 道德信念和社会责任感的丧失;
- 行为方式的野蛮化;
- 理想追求的虚无化。

所有上述现象,都动摇着我们本来就很脆弱的科学理性的信念,妨碍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利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探讨人类理性进步的发展规律,总结理性自我认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理性地对待理性,科学地运用科学,重建符合时代要求和真正科学的理性观,坚定我们的理性信念,提高我们抵御非理性主义思潮侵袭的能力。

(二)重建理性信念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旧理性主义的解体,并不是非理性主义世界观可以成立的理由,也不能确证理性主义的完全毁灭。理性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把握生存环境和理解自我的一种活动方式,因此它必然伴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形态。抽象的形而上学理性观,并非是理性信念的一般形态,而只是它的多种历史形态中的一种。因此,形而上学理性主义的终结,并不是理性主义的终结,而是理性主义走上更高形态的起点;抽象理性观的破产,并不是理性主义本身的破产,而是为它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我们知道,一定的理性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而所有的理性观念与其说是先验正确的原则,不如说是理性的特定历史形态,既然如此,我们就应把理性的历史性肯定下来,使抽象理性主义变成历史理性主义。

我们还认为,以片面发展的工具理性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的瓦解,并不等于整个理性文明的瓦解。我们也不能因西方社会科学理性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放弃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建设的诉求,转而退回到传统的文化中寻找出路。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文明仍然优于古代的传统文明。传统文明在西方文明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不断退败,就证明我们没有退路可走。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化战略,仍要以坚持科学理性和发展科学技术为主要任务。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简单地重复西方理性文化,而应以中华民族优秀的理性文化传统为前提,站在世界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高度,广泛地吸取全人类各主要文化传统的理性文明成果,建立更高形态的中国当代理性文明。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应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动地吸收和扬弃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理性文化成就,自觉抵御非理性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把握时机,复兴中国文化,创造更加灿烂的文明。我们不要看到人家说后现代,就洋洋得意地陶醉于前现代的传统文明之中,自认为这样就可超越现代主义,直接进入后现代。实际上,这是反历史的态度,只能丧

失民族文化发展的时机。在中国过多地讲后现代,其结果只能是停顿在前现代的水平。

另外,我们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非理性化,并不能证明世界文化都要走向非理性主义,更不是社会主义也要放弃理性信念的理由。因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历史的终端”,今后只能“在这里或那里进行一些修补,但不会发生根本变化”^①。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无法在这个社会的内部加以解决,因此非理性主义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出路,是资产阶级对未来感到绝望的一种表现。但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结,反而是社会进步的契机,资产阶级的绝望并不是全人类的绝望,反而是人类获得真正解放和自由的希望之所在。加拿大学者哈格罗夫(B. Hargrove)曾指出: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我恰好认为其他的东西,即更好的东西是可能的。我不能向人们提供具体计划或保证,但是当我们听到‘别无选择’时,我只能认为这表示:‘除非寻求更好的东西,否则别无选择。’”^②哈格罗夫断定资本主义并非历史的终端,但他非常谨慎地拒绝预测未来的社会形式。但是,无论如何,既然人类社会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就不必为未来绝望。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也是容易犯错误的,可是人类理性仍通过自己的曲折探索,展示了一道进步的轨迹。我们对人类的理性充满自信。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们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只有靠我们理性的实践活动,迎接历史变化的挑战,我们才能有更加合理的和更为美好的未来。

与哈格罗夫一样,我们也否认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式,但是,我们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当然,我们也不应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做过分细致的空想设计,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并非是一种先验的形式,而是

^① 参见哈格罗夫:《资本主义的未来:资本主义是否代表人类所期望达到的最佳社会?》,《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4期,第14页。

^② 见哈格罗夫:《资本主义的未来:资本主义是否代表人类所能期望达到的最佳社会?》,《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4期,第13页。

历史生成的实践过程。社会主义也不只是一种理论学说,而是实际的社会运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共产主义不应“从寻找‘本质’开始”,因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①。这就是说,尽管社会主义是最具合理性的社会,但它不是从理性原则出发,而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性特征,我们在随后一节中再做进一步讨论。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化应是科学的理性文化

(一)怎样重建理性信念?

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社会表现为人类逐渐克服自己生产活动、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的盲目性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迄今为止最具理性特征的社会,即最合理化的社会。从方法或工具理性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应当追求生产和社会运行结构的日趋合理化;从目的或价值理性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是为全人类大多数人谋福利的,这就是说,我们的工具理性应当受价值理性的约束。然而,上述两种理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是统一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就是为了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充分发展的工具理性,纳入更加公正的目的理性的轨道中。因此,就其本意而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合理化体现为一个有机的统一过程,这种合理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合理地、高效率地组织生产,有计划地、适度地开发自然资源,尽可能公正地调整利益分配关系;

——建立有序、动态的规范和制度,保障所有人民平等的政治权利,使社会生活处于一种既有秩序,又有个人自由的状态;

——创造一种健康、自由和向上的文化氛围,使人们的趣味、欲望、情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6页。

感和审美要求得到合理的表现,使人们的心理和精神生活得到不断的净化和升华,使人类的精神财富得到日益充实和丰富。

我们追求合理的特征,但是,怎样做才是合乎理性的?我们认为,这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答案。因为人类理性的目的都是要获得对客观存在和主体自身的正确认识和理解,既然人们都生活在特定的历史境遇(Dasein)中,所以理性也就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由此可见,我们只能达到更合理,但绝对不可能达到完全合理。如果说我们自认为找到了绝对理性,那么我们就等于宣布理性的终结。既然实现了绝对的合理化,那么理性的进一步探索就毫无必要性了。根据这种认识,我们探讨重建理性信念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确定哪些具体规定和原则是合乎理性的,而是研究怎样看待具体的理性观念和原则才是合乎理性的。

在此时此地是合乎理性的,到彼时彼地也许就不那么合乎理性了。如果我们固定在某个特定的理性观念和原则上,那么我们会走上理性主义的反面。近代抽象的理性主义者和教条式的社会主义者,均是因此而作茧自缚,陷入了困境。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什么是理性的,而在于怎样看待理性。什么是理性的?这只是一定境遇中要回答的具体问题。怎样看待理性?这才是贯穿人类历史全过程的问题。作为一位哲学工作者,什么是理性的,不是我主要关注的问题,它是应用学科的主要问题。我所关心的,是要通过肯定理性的历史性,破除形而上学理性观的先验抽象性质,使理性成为一种自觉地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自我扬弃、自我调整和不断进步的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从今之后,理性能够理性地对待自身,对作茧自缚的危险保持警惕,并有能力通过自我解构而实现自我超越。理性是历史的,所以只有历史理性主义才是真正合乎理性的。

由于理性是历史的,也就是说,理性只能在实际的历史活动中才能体现出来,所以理性就并不意味着绝对地排斥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历史理性主义并不

是要否认非理性因素的存在,也不是要否定非理性因素的积极性质,它只是用合理化的轨道疏导非理性的力量,并使之升华为支撑理性事业的力量。历史理性主义不是要消灭非理性,而是要引导非理性。而在这样的引导过程中,也并不是说理性与非理性处在外在的差异性之中,好像理性就是理性的,而非理性是不合乎理性的。毋宁说,理性与非理性处在一个有机统一的心理和行为活动中,合理性是一种历史趋势,而不是僵死不变的规定。坚定我们的理性信念,就是相信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人类的思维和行为必定更趋合理化。理性是人类进化的引导力量。

(二)重建科学理性的意义

研究理性观发展的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探讨重建科学的理性信念的可能性和培养科学精神的基本策略,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人类能更加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得以成立的前提之一。正像恩格斯所说的,“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甚至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未能预见的作用占据优势,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运用的力量强大得多。”恩格斯的话,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就大规模成功地运用工具理性,提高生产率而言,资本主义的确比以往历史上任何社会形式都更加合理化。但是,资本主义却没有足够与之相适应的目的理性调整社会经济的和政治的关系,社会生产和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盲目和混乱的状态中。社会财富的分配日益背离基本的公平原则,一方面是亿万富翁的财产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贫穷阶层的状况有恶化的趋势;一方面有些人被迫超负荷加速工作,另一方面却有越